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姚 选 民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却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接续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是一个历史过程,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纯粹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政治条件要素的促成,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文化条件要素的主体促成作用表明,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直接作用而非仅仅间接作用。对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中之直接历史作用的揭示,有力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论断的科学性。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 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5-0014-07

将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直观性地发问: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有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后提出并逐渐形成或成形的吗?^[1]¹⁰这一问题的提出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看待“两个三十年”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二者之间就没有关系吗?亦或说,以毛泽东为代表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探索跟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探索是完全割裂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我们认为,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二者之间存有一种直接关系。之所以秉持这一观点,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前述直观性的发问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或成形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之间也就没有一种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推断,统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刹那间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形成或成形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抑或“中国模式”^[2]¹¹¹,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或者说,在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之前,就已经处于孕育、形成或成形过程当中。另一方面,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有没有关系,不能仅仅通过形式逻辑似是而非的来推断,而需要通过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甚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成形的基本历史事实)来历史性地判断:经由一种宏观历史视野或一种政治哲学研究视角所揭示出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或基本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直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一种官方观点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3]³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的谈话中,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含义:“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

[收稿日期] 2015-09-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研究专项课题”资助(编号:14WTC17)

[作者简介] 姚选民(1980-),男,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色的社会主义”,“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3]63,65}。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正式进入党的重要文件^[4]。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形^[5]。依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官方话语脉络或逻辑,毛泽东同志似乎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或开创没有什么关系,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似乎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尽管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言论并没有明确否定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

就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论述内涵丰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0}。党的十八大报告虽然明确了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或开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这一报告却并没有明确表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话语甚或间接表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或一定关系,比如对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政治条件要素促成的表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0}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二者之间关系的间接性论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印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

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69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毛泽东同志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关系,而非一种似是而非的间接关系。

对于以上论述,人们也许会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为什么他却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涵盖的内容之一)的开创者(甚至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二者之间还存有一种直接关系)呢?其实,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还更深层次地牵涉到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具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方向和旗帜,在邓小平之前没有人全方位地明确提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旗帜^[6]。这就意味着,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一理念的首创者。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涵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切实存在的,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讲,说“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不是说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涵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开创者,而是说邓小平同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方向和旗帜全面激活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既有的有益政治经验或执政经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旗帜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贡献是首创性或开创性的。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直接关系,并不是(也没法)否定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而是要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承认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形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关系。

当然,仅凭以上梳理性分析就认定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关系,或者就此认定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有些武断,但是,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之间关系的间接性言论毕竟为我们提出这一命题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虽然不能从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言论中找到证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明确有力论据,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论据(比如学理方面的论据)来证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三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一种学理观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解读:一种前提准备

通过学理言说的方式来证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首先须要面对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或说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在准确理解这一问题之后,我们才能确定毛泽东是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作出直接贡献。基于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反观,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宏观或政治哲学层面的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至少依赖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要素:

首先,政治条件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成形,从政治方面看,主要是缘于中国形成了一种强吸聚力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的形成是分两步实现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结构从家—国政治组织模式这种前现代国家形式向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种现代国家形式转变。晚清抵御西方国家入侵的节节败退表明以家为中心的家—国政治组织模式这种前现代国家形式(即家天下皇朝政治组织模式或郡县制政治组织模式)在新历史时空中吸聚动员社会力量上的无力,使中国人开始关注并被迫效仿源自于西方的“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一现代国家形式^[7]。清王朝覆灭后,中华民国这种“虚弱型”现代国家形式虽争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但单纯宏观层面的国家组织模式仍无法有效抑制整个社会范围内具体个人层面之

以家为中心的“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维,以形成中华民族在面对国家问题上的整体同步思维习惯。第二步,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种现代国家形式的主导者或领导核心——国家执政党之政党组织形态的转变,即由松散型执政党向严密组织型执政党转变。中国国民党执政中国内地期间之所以不能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外不能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担负起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时代使命,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政党组织模式无法有效抑制国民党政治精英的“小家庭”思维,继而无法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抑制中国人的“小家庭”思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组织模式之所以具有强吸聚能力,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程序科学而严密;另一方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员的思想入党,党员间行动的同步度高。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组织模式经由其政治信念能够有效抑制中国人的“小家庭”思维^[7]。一方面存在有强吸聚能力的政党组织模式,另一方面有强吸聚能力的国家层面组织模式,于是构成了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种“强有力型”现代国家形式(即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在晚清以降的现代国际社会这一新历史时空中具有了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时代使命。这些政治条件要素的出现,很显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之成就而成形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其次,经济条件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成形,从经济方面看,主要是缘于中国在经济领域里适度释放了一种“权利本位”的国民性格。强吸聚力政治体制有其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体制模式照搬进经济领域时,则会严重压抑中国人既有国民性格于经济领域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人既有国民性格由于时空转换(即由原中华文化圈中的中国向由西方国家主导之威斯特伐利亚资本主义世界结构体系中的中国转变)在政治上出现一种“映显缺陷”(所谓“映显缺陷”其实并非是一种缺陷,而是中国人既有国民性格在近代以来中国这一新历史时空中被放大的负面性因素),即一种业已提及的“小家庭”思维,然而,吊诡的是,在经济领域,中国人政治上的“映显缺陷”却能在新历史时空中显现出一种“权利本位”国民性格。“权利本位”国民性格是奠基于中国人的“小家庭”思维之上的,这种“小家庭”思维是一种儒家伦理秩序思维:每个人在这种伦理秩序之中只要完成了自己的本分——即包括对更高位置(比如长辈、上级、国家等)的职责、对更低位置

(比如晚辈、下级等)的职责等——那么,其他的任何行为,他们都可以做。这种状况源自于西方文化的权利—义务话语逻辑,彰显出中国人的“权利本位”国民性格^[8]。而中国人的“权利本位”国民性格若被滥用,中国经济则要么会形成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小农”经济,比如晚清以前的封建经济,要么会形成一种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经济局面,比如晚清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过分抑制中国人的“权利本位”国民性格,比如形成一种对公有制的纯度有着特别偏好的高比例国有经济,则会仅仅释放出部分国内经济精英的“权利本位”国民性格,而整个中国经济体在发展程度上却会出现“天花板”效应,比如建国初期中国经济恢复后出现经济发展反复波动的“平台期”现象。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体经过不断试错实验或调适后,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默会性地感知到^[9],整个社会在经济体制上若能一方面利用“权利本位”国民性格的优长,另一方面又能抑制其负面效应,那么,整个中国经济便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或思维逻辑,不难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为何能快速跃居世界第二,甚或赶超美国。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后逐渐成形的中国经济体制适度释放了的中国人的“权利本位”国民性格^[10],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成功而形成的经济条件要素。

再次,文化条件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成形,从文化方面看,主要是缘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抑制其“映显缺陷”和“权利本位”国民性格负面影响的文化条件。中国在政治领域存在“小家庭”思维的“映显缺陷”,在经济领域存在“权利本位”的国民性格这种或然性结果的既有国民性格,若运用得适当,就会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否则,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中国改革开放后良好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方式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促成了一种文化结构条件:这一条件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跟西方文化进行大规模接触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另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从西方或苏俄所引进的新兴文化,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11]。这种文化条件一方面能让中国政治精英继续有效利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元素,比如“映显缺陷”、“权利本位”国民性格的积极作用,同时又通过以马克思主

义文化意识形态为主要代表的新兴文化元素抑制“映显缺陷”和“权利本位”国民性格对于中国进步的消极作用,以整体上实现了奠基于近代以来中国时空转换的文化自我调适,此为一方面^[10]。另一方面,当这一文化条件尤其是其中的新兴文化元素妨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发挥积极作用时,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调整文化结构中新兴文化元素的比重,倚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其积极作用,比如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典型代表之马克思主义观点思想的发展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回归。在中国积贫积弱期,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耀眼”的西方文明,无法将其作用的积极面相呈现在世人尤其是西方人面前,无法在面对西方文化时进行有效的发声,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借助源自于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元素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样不仅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发声及其方式得到国际社会甚或西方人的认同,而且借助源自于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元素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为中国或中华民族在再度强大时同时实现文化上的伟大复兴赢得了时机和时间。从这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逐渐形成之抑制其“映显缺陷”和其“权利本位”国民性格产生负面影响的文化结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条件要素。

其四,外交条件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就而成形,从外交方面看,主要是缘于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养成了一种成熟务实的现代外交思维。中国政治精英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潜移默化地习得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怀柔外交思维或“天下”^[12]外交思维,其特点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或“以德报怨”。而自中国被强行纳入威斯特伐利亚资本主义世界结构体系以来,现代国际社会盛行外交思维却是一种“丛林”思维:赤裸裸地讲究外交活动主体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13]。这种“落差”情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虽长久存在,然晚清以降至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间,中国外交一直奉行的却还是一种怀柔外交或“天下”外交思维。当这样做的时候,受伤害的总是我们自己或本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外交情状刺激、发酵着中国政治精英对传统外交思维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则是,中国政治精英发现: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或核心目标是要不断壮大自己,实现本国国家

实力的持续增长,而并非旨在维护所谓国家间的情谊,比如传统文化联系上的情谊(典型有中国与东亚其他诸国间的情谊)、意识形态同源上的情谊(典型有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情谊)等。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外交思维结构,其结构性内容是:以现代“丛林”外交思维为主,以传统“怀柔”或天下外交思维为辅。自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伊始,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韬光养晦”,即不断壮大自己的国家力量,持续提升本国的国家实力,其次才考虑立足于传统“怀柔”或天下外交思维的国家间情谊。为了本国外交的核心目标,中国可以不顾及甚或牺牲立足于传统“怀柔”或天下外交思维的国家间情谊关系,一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363}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熟务实现代外交思维的成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成形提供了重要外交条件要素。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成形,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或外交哪一方面条件作用的结果,而是这些方面条件陆续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笔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解读,以作为考察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之间直接关系的一种学术参照。当然,我们从政治精英的视角来突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作用,意不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观点,更不是秉持一种精英主义政治观,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在肯定前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潜在前提下,不仅要契合本文研究中主题的学术性质,即宏观历史视野论题或政治哲学层面论题,而且要清晰阐述或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或基本历史事实。

(二)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的直接作用:基于“模式解读”的解读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解读,不难发现,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直接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过程中的重要直接作用主要展现在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政治条件要素和文化条件要素的促成上。

就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之政治条件要素的促成而言,毛泽东同志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具有强吸聚力之政治体制的生成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首先,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看。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纠正了“唯出身论”的“机械”党建路线,主张“思想建党”的党建方略,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先前的纯粹“组织党”打造成了一个由共产党主义政治信念统领的有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4]2-3},即一个“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689},为晚清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再度统一贡献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或内核。其次,从人民军队的建设来看。毛泽东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思想,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以上,由党绝对领导军队^[15],将人民理念融入军队建设当中,克服了“单干”军事的军队建设思想,将军队“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2]689},将人民军队打造成了一支无往而不胜的军事力量,有效放大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或领导之进步政治力量的力量。再次,从现代国家的建设来看。晚清以降,中国国民党虽说初创了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一现代国家形式,但缘于国民党政治精英受以家为中心的“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维的消极影响,无法全面发挥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一现代国家形式的效用,进而无法满足时代使命对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一现代国家形式的国家职能需求。毛泽东同志科学运用人民军队力量,首先让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核心,将国民党所主导的“虚弱型”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一初期现代国家形式即旧中国,建设或塑造成为一种“强有力型”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这一相对成熟型现代国家形式,即新中国,对内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对外捍卫本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的既有生活方式,实现了晚清以来中国这一特定期现代国家的基本建设目标^[8]。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今日的局面;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4]97},就不会有毛泽东同志主导创建的、一脉相承的当下强吸聚力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不具备形成或成形的最基本政治基础。

就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文化条件要素的促成而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文化条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或主

导性的作用。党内外公认,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2]687}。其实,这一评价在相当程度上还矮化了毛泽东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政治军事的扩张,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强势示范,然而,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都无法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6]。毛泽东同志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方式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融汇在一起,促成了一种近代以来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的文化结构和条件。基于前面业已论述之文化结构和条件的基本内涵,中国政治精英(尤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由这种文化结构和条件,一方面,用源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强势示范,实事求是地走中国人自己该走、想走的路;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来抑制以家为中心的“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维这种“映显缺陷”和“权利本位”所具有或然性结果的既有国民性格的消极作用,创造性地转换中华文化的内容形式,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中智慧元素的积极作用,比如以家为中心的“各顾各家”的“小家庭”思维这种“映显缺陷”的积极作用、“权利本位”国民性格这种具有或然性结果之既有国民性格的积极作用等。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智慧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超融贯、转换能力,基本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文化结构和条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条件要素。

综上所述,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解读,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内涵的揭示,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经济条件要素和外交条件要素的促成中发挥了重要直接作用,同时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文化条件要素的促成中也发挥了部分直接作用,但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之政治条件要素和文化条件要素的主导促成作用表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直接作用而非一种间接作用。

四 结语

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模式”不会突然间就形成或成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主要是一

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知识产权”或是属于邓小平同志的,但是,这一表达所表征的中国道路的形成却是历史性的,在这条道路形成或成形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和努力功不可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世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没有最终形成或成形就否定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或成形过程中的直接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或成形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共同接续开创的,当然,在这里,这是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仅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经历近30年的艰辛探索而最终找到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也成为新时期正确看待党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形成全党全国人民共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210-253.
- [6] 江泽民.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EB/OL]. (1993-12-26) [2015-07-31].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03/content_1061185.htm.
- [7] 姚选民. 政治性格与政党制度的形成: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J]. 中共党史研究, 2012(12):121-126.
- [8] 姚选民. 谁之“官僚社会”? 何种“宪政转型”? [J]. 比较政治学研究, 2014(1):139-177.
- [9] 邓正来. 哈耶克社会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姚选民. 雷锋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种政治哲学视角[J]. 船山学刊, 2014(4):94-100.
- [11] 姚选民. 全球化话语中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基于一种问题化进路[J].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2013(2):352-372.
- [12]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M]. 王琛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 [1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Z].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 [1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1921.1—1937.6(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64-75.
- [16] 姚选民. 试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其基本条件——美国对外关系史对中国的启示[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4):22-30.

On Mao Zedo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O Xuan-mi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As the designer of the reform of revolution and opening-up, Deng Xiaoping has create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reated by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ogether. It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to form or shap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 practical problem, but not a purely theoretical issue. Mao Zed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his main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Mao Zedong plays an important and direc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nd shap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rect historical effect of Mao Zedong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cognition of the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 Xiaoping; Chinese path